

汉语佛学

评论

第二辑

专题一 伯兰特·佛尔与东亚禅学史

- 西方的东方学与禅学论述 伯兰特·佛尔
走向“行事的”禅学研究 伯兰特·佛尔
作为文本和宗教范式的菩提达摩 伯兰特·佛尔

专题二 唯识思想与东亚传统（二）

- 对现象学与唯识学所理解的深层心识结构的比较研究 倪梁康
《显扬圣教论》中的佛身论 早岛理
东亚唯识学“所知障”理论的“未臻全知”义之解读 刘宇光

上海古籍出版社

汉语佛学评论

第二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汉语佛学评论. 第2辑 / 中山大学人文学院佛学研究中心主办.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5325-5871-1

I. ①汉… II. ①中… III. ①佛教-研究-丛刊
IV. ①B948-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9125号

汉语佛学评论 (第二辑)

中山大学人文学院佛学研究中心 主办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ij.com.cn

(2)E-mail: guij1@guij.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7.5 插页 2 字数 382,000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800

ISBN 978-7-5325-5871-1

B·721 定价: 56.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序 言

汉语世界的佛教学研究虽然数量上不在少数,但总体上说还没有融入国际佛教学的研究视域当中。无论从研究的主题、资料的发掘、方法和语言的要求来看,我们离国际学术的研究规范都还存在一定的距离。汉语世界佛教学研究的学术刊物目前还很不整齐,客观地说,比较有专业学术规范的佛教学刊物大都在台湾出版。台湾目前有两到三份在汉语佛学界来讲较有质量的佛教学刊物,但这些刊物多属学报性质,从而多少限制了专题讨论和新视野的开拓。更让我们略感遗憾的是,汉语佛教学的专门学刊,基本上还保守在佛教学内部的经论和知识史的研究方面,不敢越雷池一步,与其他学科的交涉和对话都相当不够,亦很少将佛学研究契入到当代思想和社会论题的脉络之中。有鉴于此,我们会聚海内外中青年佛教学人中志同道合的一批同仁,也联络国外一些著名的佛教学者(尤其是东亚佛教思想史学者),希望在中国大陆创办一类以不同佛教学术主题为中心的研究和评论辑刊。我们试图以加深和扩大汉语佛教学研究的水平和范围为宗旨,同时建立起汉语佛教学研究与国外同行之间的对话平台。本辑刊希望尽量反映汉语佛学研究前沿状态,同时也能把国外同行的最新研究,以专题、评论和译介等不同形式传达给汉语学界。

本辑刊定位以汉语写作为主,即使原稿为英、日文等不同语种的作品,

也尽量译成中文发表,只保留少数外文语类的论文。在研究的主题方面,我们以东亚佛教为主轴,同时旁涉印度、藏传和南传佛教,举凡与佛教学研究相关的历史、哲学、思想、艺术、考古等方面的成果均在本辑刊择选范围内。本辑刊并不完全以欧洲和日本佛教学那种谨守专业分际的风格为目标,而是在发表高质量的专业性佛教学论文的同时,努力把佛教学的研究与更广泛的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讨论结合起来,把佛教学的议题置于中国和东亚思想史的脉络中来加以观察和表现。另一方面也以佛教学——这一中国和东亚重要的思想传统——去参与、介入中国和东亚思想史的研究和讨论。我们理想中的辑刊定位,既是专业学术的著作,同时也是一份思想性读物。

具体来说,本辑刊希望具有以下几项特色:(1)开发议题,带给国内佛学界新的视域;(2)思想介入,强化佛学作为思想史、学术史和当代思想不可或缺的资源;(3)国际接轨,引介前沿的佛学研究(如佛经写本研究、佛教知识论、佛教新史学);(4)借由和他者的对话,树立汉语佛教的主体性。“他者”可以指任何思潮——现象学、诠释学、女性主义、绿色思潮、批判理论、伦理争议等;(5)规划研讨会和工作坊,提供国际交流平台,不断累积新的专题与稿源。

我们主张以《汉语佛学评论》为辑刊名的理由是,“汉语”表示现在发声的位置,也包含古汉语在内,如此就可涵盖整个东亚汉文字圈的佛教系统。这样既区别于 Indo-Tibetan Buddhism(印藏佛教),Theravada Buddhism(南传佛教),又不会仅仅局限于中国佛学。“评论”而非“研究”,此合于本辑刊所期许发挥的“思想介入”的作用。

本辑刊的基本构架是每辑都以一到两个研究专题为中心,以反映海内外重要的佛学研究状况,或有针对性地为汉语佛学界带来不同方向的思想议题;同时也组织发表一些上乘的研究论文和译文。我们还希望组织国内外佛教学研究最新动态的综合评述和分析,并对一些新近出版的重要佛教学著作进行评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这个任务对我们来说都还是任重而道远。我们恳切地希望得到学界和教界各方面的支持,让我们能够共同营造汉语佛学研究的新视界。

目 录

专题一 伯兰特·佛尔与东亚禅学史 / 1

西方的东方学与禅学论述 [美国]伯兰特·佛尔 / 4

走向“行事的”禅学研究 [美国]伯兰特·佛尔 / 15

作为文本和宗教范式的菩提达摩 [美国]伯兰特·佛尔 / 38

专题二 唯识思想与东亚佛教传统(二) / 53

最终意识与阿赖耶识

——对现象学与唯识学所理解的深层心识结构的

比较研究 倪梁康 / 56

《显扬圣教论》中的佛身论 [日本]早岛理 / 82

东亚唯识学“所知障”理论的“未臻全知”义之解读

——以“十障”说的最后三障等概念为线索 刘宇光 / 87

初期禅史研究 / 149

从《六祖坛经》及有关惠能早期文献所引经典探其属性

——以所引般若系经典为探讨对象 何照清 / 151

汉传佛教史传文献中之宗派思想略探

——以永嘉玄觉之传记为例 黄绎勳 / 178

佛学新知 / 193

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佛教的早期研究 [法国]梅谦立 / 195

佛学观点下的意识研究

——以“神经现象学”与“冥想科学”为例 林建德 / 224

近代东亚佛教史 / 251

近代东亚佛教共同体之构想

——小栗栖香顶《北京护法论》之考察 陈继东 / 253

“法相广于唯识,非一慈恩宗所可概”

——试论“唯识、法相分宗说”在欧阳竟无佛学思想中的
奠基地位 张志强 / 295

判教研究 / 359

日本判教(教判)的开展

——作为经典解释的基础 [日本]末木文美士 / 361

佛寺志研究 / 375

中国佛寺志初探及书目研究 [德国]马德伟 / 377

书评 / 409

中国佛教:嫡传抑或私生子

——评《走进中国佛教:〈宝藏论〉解读》 夏志前 / 411

汉语佛学机构简介 / 417

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简介 释惠敏 / 419

从“中华佛学研究所”到“法鼓佛教学院” 释惠敏 / 423

《汉语佛学评论》约稿 / 429

CONTENTS

Special Topic: Bernard Faure and the History of Eastern Asian Buddhism / 1

Western Orientalism and Chan Discourses Bernard Faure / 4

Chan Study: Toward a Performative Scholarship Bernard Faure / 15

Bodhidharma as Textual and Religious Paradigm Bernard Faure / 38

Special Topic: The Thought of Mind-only (vijñānamātra) and the Tradition of Eastern Asian Buddhism / 53

The Last Consciousness and the Ālaya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Deep-Consciousness-Structure in Yogacara Buddhism and Phenomenology 倪梁康 / 56

The Study on the Buddha's Body of *Xianyangshengjiaolun* 早島理 / 82

“Unattained Omniscience” in the East Asian Vijñānavāda's Theory of Jñeyāvaraṇa

—According to the Last Three Obstructions in the Doctrine of āvaraṇa and etc 刘宇光 / 87

Early Zen Buddhism / 149

The Examination of the Feature of the *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based on it and the Quoted Scriptures from the Early Literatures related to Huineng

—Objects Investigated on the Quoted Canons of the Prajñā School 何照清 / 151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School (宗) in Yongjia Xuanjue's Biographies 黄绎勋 / 178

New Approaches to Buddhism of Buddhist Study / 193

Chinese Buddhism and Threat of Atheism in 17th Century Europe: An Early Inves-

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by Jesuit Missionaries Thierry Meynard / 195
Studies on Consciousness from Buddhist Viewpoints

—Case studies on Neurophenomenology and Contemplative Science 林
建德 / 224

Research in Recent East Asian Buddhist History / 251

The Imagination of Constructing a Buddhist East Asian Community

—A Study of Ogurusu Kocho's Beijing Hufalun 陈继东 / 253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Dharmalakṣaṇavāda and Vijñānavāda in Ouyang
Jingwu's Buddhist Thought 张志强 / 295

On the Tradi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Buddhist Doctrine (panjiao) / 359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Evaluation as the Basis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anons 末木文美士 / 361

A Study of Buddhist Temple Gazetteers / 375

Bibliographical Notes on Buddhist temple gazetteers, their prefac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 Buddhist canon Marcus Bingenheimer / 377

Book Review / 409

Chinese Buddhism: Legitimate Scion or Mongrel Offspring

—A Review on Coming to Terms with Chinese Buddhism: A Reading on
Treasure Store Treatise 夏志前 / 411

The Brief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Buddhist Institutions / 417

The Chung 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of Dharma Drum Mountain
释惠敏 / 419

From Chung 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to 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释惠敏 / 423

Notice to contributors / 429

专题一 伯兰特·佛尔与东亚禅学史

【编者按】

佛尔(Bernard Faure)是西方世界近二十年来在东亚佛教学尤其是禅学领域中,最有影响力同时也是颇具争议性的学者之一。他先后就读于巴黎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等“中国学”研究重镇,并曾受教于禅学史大家柳田圣山,最后在巴黎第七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这种独特的经历,使得佛尔对于欧陆东方学传统、日本京都学派历史文献学研究传统,乃至法国前沿性的“后学思潮”和人文研究方法论均非常熟悉,并加以有效整合,融入到其禅思想史研究过程中,从而重写了早期禅,尤其是北宗的历史。他对东亚禅文化研究传统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评,较大程度地影响了西方禅学研究的进程。在此过程中,佛尔也形成自己独特的禅学研究风格与话语系统。可以说,佛尔的研究成果乃是建立在其对东亚尤其是日本禅学研究传统颇具颠覆性反思的基础上,他揭示了隐藏在从铃木大拙、胡适、柳田圣山以来的东亚禅学史研究中的宗派主义、政治绝对主义,以及客观主义历史学的预设,力图突破现有研究的“典范”,从而在新的理性地基上重构禅宗史的面貌和禅学研究的言说方式,这种学术研究中的解构倾向也使其遭受各种批评。

对汉语佛学界而言,佛尔关于早期禅研究及东亚禅文化的批判性研究尤其值得注意,他的北宗研究使人印象尤为深刻:在《正统性的意欲:北宗禅之批判系谱》(基于博士论文的改写稿)一书中,佛尔深入敦煌写本和碑铭文献,立足于对中唐时期政治、经济和知识的语境的宏观把握,并在东亚佛教视野这一宽广背景下,借助当代西方前沿性学术思潮所给予的视角对“北宗”进行新的解读。通过对七八世纪之交的“北宗”教义和祖师世系的批判性考察,该书重写了早期禅史,在该领域中标志着与传统研究的断裂(该书的中译本即将面世)。此外,佛尔还对早期禅史的书写史进行系统的批判反思。这种批评性思路也可见于本专题中《作为文

本和宗教范式的菩提达摩》一文。对于一些传统的东亚佛学论题，佛尔也经常能够机杼别出，作出开创性研究。他关于“一行三昧”、“顿渐范式”、“公案”和“僧传”等方面的论述常使人耳目一新。佛尔的研究最可贵之处在于哲学解读和政治历史的考证梳理相结合，同时又富于文学批评色彩，现今学科分割愈趋琐碎，做到这点自然相当不易。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佛尔的禅学写作具有强烈的方法论反省意味。他擅长于将禅史研究置于西方书写传统，尤其是在当代西方思想中进行考量，在学科交叉性背景中对禅研究史进行多视角的考察，从而体现出丰富的理论素养和犀利的批判性思考方法。实在地说，这一点在其他禅学研究者那里则很少见到，其可贵之处在于使得禅学研究进入知识的公共视域，不再与主流思想脱节，仅仅满足于自说自话。在理论资源方面，佛尔擅长于将西学前沿尤其是后结构、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和禅学的历史材料和学术实践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提出了“禅的东方学”、“禅帝国主义”、“行事的学术”等富有冲击性的命题。这种方法论方面的见地尤其体现在他的《禅的洞见和溢见：禅传统之认识论批判》一书中。本专题中《西方的东方学与禅学论述》、《走向“行事的”禅学研究》两篇即选自该书。对于汉语禅学研究而言，如何对自身的学术言说产生方法论的自识和警醒，佛尔的研究极具鉴取意义。

正如佛尔自己所言：“洞见即盲点。”毋庸置疑的是，佛尔的禅学研究亦有其缺陷。例如，当其实施“行事的学术”，从政治和权力的视角来对早期禅进行系谱学颠覆时，未免执著于将一切思想论述政治化的简单性叙事，从而遮蔽了禅史那些纯粹学理性论辩所敞开的多元化视角，由于其重点论述的是“禅史”，对于禅的经验却所言甚少。此外，在其大量援引西方思想资源对东亚佛学传统进行“另类解读”时，也逃不脱附会性的“洋格义”的批评。对于汉语禅学界而言，“欲求超胜，必先会通”，只有充分汲取包括佛尔在内的日本和欧美佛学研究的学术成果，汉语禅学研究才能够迈入新的境界。基于上述理据，我们组织翻译了佛尔禅学研究的成果点滴，以飨读者。

西方的东方学与禅学论述*

[美国]伯兰特·佛尔

(哥伦比亚大学)

在这儿你将发现诸多矛盾。因为没有矛盾,就不可能产生任何思想的活动,虽然我们不是在作几何学,但其思想运作却几乎是严格的。

保罗·瓦莱瑞:《原本如此》

过去几十年对于禅佛教已经有了大量著述,然而,我的这部《禅的洞见与滥见——对禅宗传统之认识论批判》一书并不属于那种过于泛滥的有关“禅神秘主义”一类的著作。本书意在分析被标识为禅的那类叙事(discourse)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及其各种限制。本书的主旨就是提供一种有关禅的“解剖学”(topology)——就是说,分析禅的各种主题(topoi)和范畴——把禅学研究开放给其他学科所提出的问题,以期把禅学研究融入西方思想的主流当中。我主要对禅的意识形态满怀兴趣;“意识形态”这个词,既可以从它一般使用的意义上来理解,也可以从阿尔都塞

* 译者按:该文译自 Bernard Faure, *Chan Insights and Oversights: An Epistem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Chan Tra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11) 一书的“导言”,标题为译者所加,内容略有删节。

(Louis Althusser)的意义上理解,即他把意识形态解释为这样一种观念,它表现了与实在关系之间一种颠倒的图式。〔1〕

当使用单一语词似乎就可以穷尽禅的意义时,为什么在英文叙述当中,要分别使用两个不同的语词——Chan 和 Zen——来指涉禅的内涵呢?众所周知,Zen 是日语译读中文字禅(Chan)的发音(中文“禅”这个词本身是对梵文 dhyāna 的音译),而 Zen 是从 Chan 佛教传统中发展出来的。不可否认,“Chan”与“Zen”之间具有一种连续性,大多学者也认为这两个语词之间可以互用。然而,他们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历史、文化和思想上的区别,这些区别并不能视为表面现象:如果说禅这个词有所指涉的话,它们实际影响了对禅的“本质”的不同理解。本书的两个基本预设就是,并不存在有所谓禅的“本质”;同时,如果专门讨论“Chan”与“Zen”这两个概念的话,他们之间也存在着非连续性的方面,而且这种非连续性至少与他们之间的连续性一样明显。可以肯定,从历史的方面看,Zen 是承续 Chan 的传统而来,但是 Zen 从 Chan 那里承传了些什么呢?更确切地说,Zen 并没有在“初期禅(Chan)”和“经典禅(Chan)”所遗留下的那些尚未探索的领域里繁荣发展吗?Chan 和 Zen 都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流动着的、不断变化着的网络式结构。也许可以把他们比作维特根斯坦所分析的那类“鸭-兔”图式,在这里,人们根据不同的观点进行观察,一种图式(如鸭)的出现通常是以牺牲他者(如兔)为代价的。因此,如果我选择强调 Chan 传统的某些方面,就有可能忽略其他的因素(如 Zen),这并非要否认 Zen 传统的重要性,而恰恰是去丰富对 Zen 进行“理智的”和哲学的解释。

禅的传统首先是通过有关祖师谱系的叙述而获得它的合法性的。尽

〔1〕 杜比(Georges Duby)把意识形态定义为在特定社会内部,赋有一种存在和历史作用的“表达(在某些情形下的图像、神话、观念或概念)系统(这一系统拥有它自身的逻辑和严密性)”(Georges Duby,“Historire Sociale et ideologie des societes”,In Faire de l'histoire, ed. Jacques Le Goff and Pierre Nora, Vol. 1. *Nouveaux Problemes*, 203—230, Paris Gallimard, 1974, p. 149)。然而,对阿尔都塞来说,意识形态也指向“主体与他或她真实存在状况之关系的想象式表达”。(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Ben Brew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Foundation, 1972, p. 162)

管这里有些叙述受到了历史学家的质疑,但是人们却很少细察这一叙述本身的意识形态功能。我并不想重复这些过程而把禅宗历史转变成一种“完美的佛塔”(seamless stupa)——这是一种在禅文献中时常被用以表示死亡和完美的象征。禅传统的同一性并不能从它的表面内容来获得。无论是 Chan 还是 Zen 都包含了大量不同宗教和思想的潮流,有一些思潮还附着在完全不同的宗派里,以不同的形式一再出现。光是这一点就应该改变我们对这样一个事实的看法,即为大部分禅宗学者所使用和滥用的那些宗派范畴,并不可能是用于理解禅宗思想实际消长的最恰当的方法。

有关禅学的研究,在战后的日本特别繁荣。这些研究似乎也获得了西方学术的某种认可,尽管禅与西方反主流文化的广泛接触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才开始的。禅学研究的这一发展主要缘于 20 世纪初敦煌文献的发现及其陆续的开发。基于新的禅宗手稿的发现,像胡适、柳田圣山这样的亚洲学者对禅史研究的开拓性贡献,已经开始了对初期禅史进行根本性的重写。现在这一潮流已渐进尾声,新的素材业已出现,该是我们重新思考作为宗派传统和作为研究对象的禅各有哪些不同的预设前提的时候了。

这里首要的任务就是质疑传统禅学各种争论的有效性。这可以使我们把研究的焦点从那些已有大量论述的领域转移到因为各种原因而相对被传统学术所忽略掉的那些问题域。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学的方法需要一些其他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或文学批评等方法论来加以补充。当然,每一种方法论的进路都创造了它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且也必须反过来,就其方法论和其诠释、认识论的基础接受质疑。特别是,我们必须记住,每一种方法无论其自称如何的“客观”,都包含了某种在学术领域里承担着特殊作用的意识形态于其中。尽管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正确地敦促我们“要使客观自身客观化”,澄清作者的立场,但正如他自己也似乎相信的,这样做还是无法确保会出现一种过于自夸自擂的“科学性”。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一直信赖于一种学术的“沟通模式”,这在于他们相信只要他们对可能影响客观性的观察者的主观性进行再分析,他们就可以逐渐获得客观性。更为普遍的问题是,社会科学家通常都会忘记他们所追求的所谓的

“科学性”理想,其实都是非常勉强的,因此,他们轻视他们学术叙事当中所具有的行事(performative)和修辞的性质,忽略他们所谓科学工具背后的符号学功能。甚至那些最具有反思性和“对话式的”论述也如传统所谓的那些“客观性”学术一样,都含藏了表演和行事的意义于其中。〔1〕

禅学研究尽管已经拥有很高水平的语言文献学方法,但是它还没有达到像人类学或文学批评这样一些学科那样成熟的方法论高度,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局限在历史或诠释学的方法里。本书的第3章将会考察中日禅宗历史学的主要特征及其局限所在。在这之前,我想先在此集中讨论不同的认识论和诠释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处理像禅宗这样传统的宗教和思想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这里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我们必须承认所谓的诠释循环,并认识到我们都处在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所说的“效果史”中。于是,我们对禅宗的理解不仅要从中日历史学的成果中获取教益(一定程度上我们还要继续依靠他们的研究),而且还可以从整个东方学传统中去进行理解。因为东方学引发的各种不同的学科可以使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文化当中来确认禅的空间,特别是在西方对佛教所接受的语境中来从事对禅的理解。为此,由萨依德(Edward Said)在他那部奠基性的著作《东方学》中所提出的一般性问题,也与禅的研究特别相关。

禅,作为另类的东方学

萨依德指斥东方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着的倾向,乃是希望揭示出一切论述都具有历史性,如果否认这点,那这一论述本身就会矛盾百出。然而,他的批判同样也不能够摆脱相同的缺陷——这一点,任何的批判都是如此。当萨依德把西方文化不加区别地看成为铁板一块和一种不可救药的否定性“本质”时,他显然忽略并且有时是简单遗忘了非西方的文化论述中也重复着类似的否定性本质。

〔1〕 Paul Rabinow, *Representations are Social Facts: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in Anthropology*, In *Writing Culture*, ed. ,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234—261.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尽管萨依德主要对有关近东和伊斯兰的东方学论述有兴趣,但他的论点对远东的情况同样有效。特别是印度和中国已经成为类似的东方学论述对象——这或许可以在黑格尔的这一判断中获得最好的总结,他认为中国和印度并不拥有他们所说的那一切。关于此,我们在第1章还会回过头来讨论。这种东方学的预设现在还非常普遍,甚至表现在像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这样一些更为精密的思想家的论述之中,他们相信“西方哲学可以(从印度和中国)了解到如何去重新发现与存在间的关系,以及这一问题最初是如何产生出来的。同时还可以审视这样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即当我们不把自己视为‘西方人’时,我们如何重新开放对东方的看法”。

当梅洛·庞蒂在东西方传统中均洞视到了一种更广泛的理性存在时,大部分期待东方宗教(特别是禅)的人还是确信西方理性已经失败,而且他们(在东方宗教中)追求着一种被认为是西方已经失去了的“真实性”。对他们而言,亚洲已经成为一切智慧之源,欧洲已经不再拥有它自己的话语。这样一种与传统东方学立场相反的论述,标示着西方对于禅的理解所发生的变化,也表示了某些人类学论述的潮流。但是,如果我们以为这一变化代表了西方的主流,我们就错了: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在西方的论述中,无论是东方还是其他的远古社会,都是被讽刺化或理想化了的。西方论述中的这种种族中心和东方学的前提并没有改观。

尽管萨依德对东方学的批判早已过时,但是他的激进主义不仅在某些方面成为一种反向的种族主义的案例,而且还证明了一种相反的效果,即他遗忘了甚至那些最鲜明的东方学方法也曾经产生过有价值的洞见,他也没有意识到他那种后东方学的观念也有其自身的盲点。意译日本禅师道元(1200—1253)的话说,就是“阐明的同时也在进行着遮蔽”。因此,人们通常都与他们所批判的那种方式一样,而赋予自己所保留着的某种意识形态观念以特权。萨依德并没有充分地意识到,有些早期学者从东方学那些观念的陷阱中逃脱出来,我们并不能够简单把他们都视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代言人。萨依德没有能够意识到社会历史和认识论的变